

关系网络类型对农村低保退出的影响*

——基于2015—2017年全国农村困难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王燊成 杨良伟

提 要：基于2015—2017年全国农村困难家庭调查数据，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方法，发现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退出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在对关系网络类型进行分类后，本研究发现垂直型关系网络是农村低保退出的关键影响因素，而互惠型关系网络对农村低保退出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中介分析表明，在规模上，垂直型关系网络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对此，建议在基层治理中，应优化低保实施并帮扶贫困家庭成员寻求就业途径与增收方式，切实保障低保对象有进有出。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 垂直型关系网络 互惠型关系网络 低保退出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低保工作的重点开始从“应保尽保”转向“应退尽退”（安超，2021）。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不仅强调“坚持应保尽保”，而且强调“坚持动态管理”，即要求“切实做到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有降”。低保退出机制是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其建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刘峰，2012）。尤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作为社会救助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农村低保的精准退出既是实现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提高社会救助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规避陷入福利过度陷阱的重要体现（吴忠民，2023）。

* 本文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专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研究”（项目编号：2023ZDZX039；主持人：王燊成）阶段性成果。

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自2013年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规模逆转增势,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5382.1万人下降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3329.0万人。^①因此,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重心逐渐从探讨农村低保退保难问题(高灵芝,2009;乔世东,2009;肖萌等,2020),转向低保退出何以发生的实证性研究(岳经纶、胡项连,2018;安超,2021)。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利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2015—2017年三期追踪数据,引入久期模型以回应关系网络类型对农村低保退出的影响。之所以聚焦关系网络这一核心自变量,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围绕关系网络与农村低保的关系已经展开大量研究,尤其是关系网络与低保资格瞄准偏差的关系(魏程琳,2014;刘凤芹、徐月宾,2016;仇叶、贺雪峰,2017)。这也是相较于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在转型与变迁的乡土社会中福利瞄准偏差最具典型性的表现(崔宝琛,2019)。一方面,研究者认为低保救助向非贫困群体泄漏主要是基层干部在救助资源分配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刘凤芹、徐月宾,2016;李迎生等,2017)。另一方面,邻里关系也在农村低保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魏程琳,2014;乐章、程中培,2017),部分村民心中甚至产生了“能吃低保证明人际关系好”的观念(高瑞琴、叶敬忠,2017)。然而,尽管人们注意到农村社会中关系网络对于低保获取起着“助推”作用,但是对于低保退出,关系网络是否也会存在相似作用?对此,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实证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低保退出的影响因素

低保退出是一种复杂的行为结果。既有文献指出,低保退出受到个体特征、福利给付、制度实施、宏观环境等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个体特征上,性别、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往往被视为影响福利退出的重要因素(Hohmeyer & Lietzmann, 2020)。在低保的相关研究中,肖萌等人(2019)的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2022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2-11-25)、《2013年第4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2014-01-25), <https://www.mca.gov.cn/n156/n185/n315/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月22日。

研究表明,女性总体来说比男性的退保可能性(低保接受时长)更高且女性的退保高峰比男性到来得更早;整体来看,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低保对象越可能较快退出;健康状况对于退保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越健康越容易退保。不过,也有研究认为,男性的福利依赖倾向是比较低的(黄薇、曹杨,2022)。由于女性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承担传统的家庭责任,因此低保对其产生的负向就业激励尤其显著,更不易退保(韩华为,2019)。

在福利给付上,低保长期领取引发的福利依赖以及各项专项救助与低保相捆所引发的福利叠加是影响低保退出的两大因素。从逻辑上讲,社会救助应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韩克庆,2015),与西方学者强调福利长期领取会产生“时间依赖(time dependency)”“久期依赖(duration dependency)”(Murray, 1984; Bane & Ellwood, 1986; Hohmeyer & Lietzmann, 2020)等观点一样,国内一些学者同样发现低保的长期领取滋生了福利依赖心理与行为,弱化了低保对象的竞争力,增大了其退保难度(黄晨熹,2007;刘璐婵、林闽钢,2015)。不过,也有研究发现,低保福利的长期供给并未导致低保对象就业积极性的下降(韩克庆、郭瑜,2012;肖萌、李飞跃,2017)。甚至有研究表示,随着低保接受时间的延长,低保对象的退保概率不降反升(肖萌等,2019;安超,2021)。对于中国低保退出难的现象,也有学者强调并非是保障标准过高,而是由于低保资格附着着很多连带的利益(徐月宾、张秀兰,2009),这种福利叠加必然形成贫困人口对低保救助的依赖。安超(202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福利叠加”会对低保家庭产生“锁定”效应,并且福利叠加越严重,退保的可能性越低。

在制度实施上,制度的公平性、救助的精准性、家计调查以及“福利污名”等也与低保退出紧密相关。制度的公平性往往会影响福利对象的行为规范与主观认知,公平的制度有助于人们形成更为自律且规范的行为(黄爱宝,2013)。家计调查被视为福利退出的重要干预工具(Wellschmied, 2021),较为严苛的家计调查可以使低保对象降低对低保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低保对象退出低保。救助资源能否完成精准匹配,不仅影响着制度的公平性,而且还会产生行为的盲从效应。“福利污名”被视为福利参与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福利进入、促进着福利退出(Contini & Richiardi, 2012)。有研究发现,已经受益的受助者的确会因担心“福利污名”扩散而主动退出救助(李琴、岳经纶,2021)。

在宏观环境上,有研究指出,低保的“参保”时机对“退保”概率具有显著影

响(肖萌等, 2019; 安超, 2021)。肖萌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 由于不同时期非正规就业水平的差异, 随着低保期群从早期进入组(2002年以前进入)向中期进入组(2002—2007年进入), 再向近期进入组(2008年及以后进入)推进, 退保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安超(2021)的研究也认为, 初次接受低保的时机对退保概率存在某种调节效应, 较晚进入低保的群组, 面临日趋严格的低保执行环境以及持续改善的就业环境, 其退保概率相对更高。此外, 系列研究表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实施背景下, 由于低保管理的严格化(关信平, 2019)、反腐压力下“向上负责”的行动逻辑(岳经纶、胡项连, 2018)、信息数字技术在低保治理中的广泛运用(刘万里、吴要武, 2016; 陈锋、朱梦圆, 2019; 李琴、岳经纶, 2021)等福利治理新方式、政策新工具的出现, 近年来“退保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二) 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实际上, 自从伍尔科克(Woolcock, 1998)开展社会资本减贫研究以来, 既有的文献脉络已经证实关系网络在外来“资源输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已有研究发现, 关系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就业信息、工作机会、低息贷款等各种内外部资源(叶静怡、周晔馨, 2010; 王春超、周先波, 2013; Li & Sicular, 2014; 刘艳霞、张诗怡, 2023)。因而, 关系网络往往被视为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关键影响因素(Marsden, 1987; 边燕杰、李煜, 2001)。不过, 也有研究强调并非所有的关系网络均能发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作用(Cleaver, 2005; Falco & Bulte, 2011)。这启示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区分低保对象所能调动的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 并考察其在低保退出行为中的成效。

一般而言, 关系网络指的是基于成员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 建立在一系列协作基础上的连带网络。对于关系网络的类型, 当前学术界往往按照特定理论内涵, 从关系网络的某一特征或维度进行划分。例如, 边燕杰(Bian, 1997)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在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争论中, 主要基于人际关联程度进行区分。另外, 帕特南(Putnam, 2001)提出的“粘连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则依据网络结构的开放或封闭特征进行划分。此外, 伯特(Burt, 2004)的“结构洞”理论是根据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关系网络类型划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强调关系网络中的“端点”, 即连接主体

的重要性。在这一视角下，本研究主要关注低保对象关系网络的两个关键“端点”：纵向维度的基层干部与横向维度的邻居。具体而言，按照关系网络中端点的展开方向，根据精英理论视角和社会交换理论，区分出“垂直型关系网络”和“互惠型关系网络”，分别表示村民在纵向上嵌入在与乡村精英进行交往的垂直型关系网络中，而在横向上嵌入在以邻里交往为中心的互惠型关系网络中。

1. 垂直型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在乡村日常生活场域中，精英理论视角是透视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后，部分村民通过乡村干部身份的获取而成为“乡村权力精英”（郭忠华、夏巾帼，2022），参与到对体制内资源的整合与分配过程中（张国磊、张新文，2017）。乡村基层干部作为重要的关系网络端点，是连接国家与村民的重要行动者，直接参与政策信息、就业机会、福利政策的宣传与分配，使得垂直型关系网络成为村民获得关键信息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胡琳玉、万成龙，2023）。

在中国社会政策体系中，国家虽然提供了社会福利资源，但是乡村基层干部在确定资格和某些类型资源的分配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除自主空间外，在实施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承担着脱贫攻坚的具体任务，并在提供贷款优惠、引进企业资源、帮扶贫困户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Liu & Wang, 2023）。例如，基层干部的帮扶有助于形成“乡村精英—贫困户”的扶贫链条，支持贫困户获得产业扶贫贷款，进而改善贫困户的经济生活水平（闫春华，2019）。已有研究指出，村干部掌握了村民的福利、用工、宅基地等集体利益的分配与调整，也承接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和社会政策的执行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民的利益（吕德文，2019）。因此，认识村委会干部可以增加低保户家庭从市场和国家获得增加收入的关键政策信息、优质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个体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退出低保。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H1：垂直型关系网络对低保对象的低保退出可能性具有正向影响。

2. 互惠型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长期以来，互惠被认为是构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Katz & Powell, 1955）。在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中，社会交换理论是理解村民间互惠型关系网络形成的重要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资源是社会交换过程中的重要物品，而互惠则是长期重复的社会交换行为中最有效的形式，一旦形成互惠关系，施惠方和受惠方就要承担和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Foa & Foa, 2012; Molm, 2010）。

一方面,既有研究认为互惠型关系网络是个体获得资源和支持的可靠渠道,并提供了互惠型关系网络有助于个体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实证证据。一项基于18个贫困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家庭通过当地邻里网络获得支持从而实现脱贫(Banerjee, 2012)。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关系网络等有助于降低家庭贫困及脆弱性(尹志超、张栋浩, 2020)。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网络能够缓解多维贫困水平,扩大社会交流范围,改善社会支持网络(金光照、陶涛, 2022)。丰富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户获得更多家庭经营活动资源并扩大收入来源(杨均华、刘璨, 2019)。此外,在我国,尽管存在基层干部干预脱贫资源分配的自主空间,但我国的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往往设计了意见征求、民主评议的方式来决定脱贫项目的落地以及脱贫资源的分配(周玉龙、孙久文, 2017; 陈锋、朱梦圆, 2019)。因此,建立更大规模的互惠型关系网络可以增加低保户家庭通过脱贫项目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从而实现退保。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互惠型关系网络弱化了个体资源的多样性,而无法获得其他类型的稀缺资源,从而限制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可能性。有研究发现,低保户的邻居、亲属、朋友大都是低保户,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同质性(卜长莉, 2019)。低保家庭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关系依赖及其强关系的高度同质化,都对低保家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形成限制(李正东, 2018)。因此,互惠型关系网络也有可能无法对低保退出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对待验证的假设 H2-1、H2-2:

H2-1: 互惠型关系网络对低保户退出低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2: 互惠型关系网络对低保户退出低保没有显著影响。

3. 中介机制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低保退出的多维影响因素已被研究者所证实,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大都只是将低保退出视为一种笼统意义上的减贫结果,较少分析低保退出的内在机制。事实上,低保退出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福利资格的退出行为。具体而言,外来资源的输入对低保对象产生了“增收减支”效应,进而引发福利替代,使受助对象无须继续依靠低保福利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生活消费是衡量低保户家庭生活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艾广青等, 2009; 梁晓敏、汪三贵, 2015; 孙婧芳, 2021)。如图1所示,资源的输入以增加家庭劳动收入、或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方式改善了低保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当家庭经济

状况更新值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线，退保行为就会发生。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设 H3 和 H4：

H3：关系网络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H4：关系网络通过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方式，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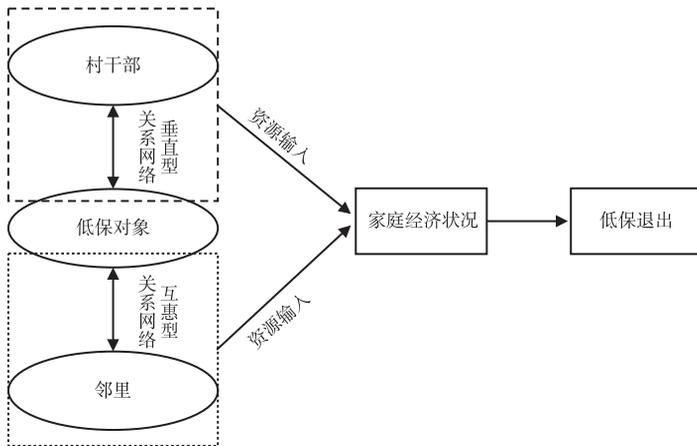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该项目是由民政部立项、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从 2015 年开始，该项目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CAPI）的调查方式，按照“全国—省—区（县）—乡镇—户”的顺序，采用分层、两阶段不等概率整群抽样设计。具体而言，首先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层中按照经济、人口、教育等指标采取隐含分层方式综合排序，使用按规模成比例的概率（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抽样抽取样本区县；其次在样本区县内，运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的“低保户和困难户社会救助对象名录”“救助申请家庭（低保退出家庭）、其他生活困难户名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户”，依次通过 PPS，简单随机抽样抽取村（居）样本；然后在每个村（居）样本中进行整群抽样

抽取受访家庭。受访家庭选择一名成员填答问卷。调查对象包括领取低保的家庭、未领取低保的低保边缘家庭和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低收入家庭。在 2015 年基线调查的基础上, 2016 年该项目展开了追踪调查, 2017 年考虑样本流失问题, 因此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追踪调查的基础上还增加了部分新入库样本。2015 年数据包含了 4232 户农村家庭, 2016 年数据包含了 2952 户农村家庭, 2017 年数据包含了 3095 户农村家庭。之所以选取该数据库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 本研究涉及的议题属于社会救助项目, 社会救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困难家庭, 而该数据库是专门针对全国范围内城乡困难家庭构建的; 另一方面, 本研究主要关注退保行为, 需要在一定时间区间内来实现追踪式调查, 而该数据在 2015—2017 年的三年中开展的调查刚好形成了一个面板数据库。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退保行为, 因此在综合考虑 2015 年享有低保且 2016、2017 年进行过追踪调查的样本基础上, 共获得了 1248 个样本、3744 个观测值可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二) 变量设置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垂直型关系网络和互惠型关系网络。参考既有文献, 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作为乡村基层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村民日常接触权力的重要端点(郭忠华、夏巾幅, 2022; Liu & Wang, 2023)。本研究从规模和强度两个维度来测量垂直型关系网络。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是根据受访者认识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数量来测量, 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于“过去的一年, 您认识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数量是多少”的回答来测量, 数量越多, 表示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垂直型关系网络的强度则根据受访者与村/居委会的交好程度来测量, 通过询问“您和家人遇到困难时, 是否选择向村/居委会求助”来测量。

既有文献对互惠型关系网络的测量, 通常使用“可寻求支持的人员数量”进行衡量(Tilburg et al., 1991)。这种方法假设互惠型关系网络具有可叠加性, 关注提供特定类型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 认为个体只有从他人处获得支持, 才可能回报支持(Buunk & Schaufeli, 1999; Molm, 2010; Walker et al., 1993; Tilburg et al., 1991)。对于支持的类型, 鲁克(Rook, 1987)区分了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社会支持。其中, 情感支持对于低保户家庭而言更加重要。方菲(2012)的研究指出农村低保户受到污名化的标签而难以获得支持, 难以融入周围的关系网络。因

此,本研究从规模和强度等维度测量互惠型关系网络。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于“过去的一年您遇到烦心事时,可以倾诉的邻居数量”的回答来测量,数量越多,表示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越大。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根据受访者与邻居的交好程度来测量,使用“您和家人遇到困难时,是否选择向邻居求助”的回答结果。

2.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既有文献表明,家庭劳动收入是低保户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通过参与就业劳动而获得(艾广青等,2009;孙婧芳,2021)。因此本研究将家庭劳动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之一,并通过询问“过去一年全年,您的家庭劳动收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及其他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是多少”来测量。同时,既有文献表明低保户家庭面临着支出型贫困,即家庭生活消费支出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时则会使家庭陷入贫困(刘央央、钟仁耀,2019)。因此,本研究将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作为另一中介变量,并通过询问“过去一年全年,您的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含食品、衣着、教育、医疗、住房、婚丧嫁娶、水电燃料采暖、文化娱乐、交通费、邮电通讯费等)总计是多少”来测量。在具体操作中,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单位均设置为千元。

3. 因变量

低保对象的退保可能性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在事件史分析模型中,退保可能性指的是受访者在2015—2017年退出低保的概率或者风险。对于事件发生者,生存时间是从享受低保到退出低保的时间;对于事件未发生者,生存时间为进入低保到调查截止之间的时间。如表1所示,2015年共有1248名村民享受低保,但是在2016年有192名村民退出低保,当年退保占比为15.4%。在2017年有100名村民退出低保,当年退保占比为8%。2015—2017年累计292名村民退出低保,退保占比为23.4%。

表1 2015—2017年享有和退保情况

	2015	2016	2017
享受低保人数	1248	1056	956
累计退出低保人数	0	192	292
总数	1248	1248	1248

4. 控制变量

基于低保退出影响因素的已有发现,本研究主要控制四个方面的变量:个体特征、福利给付、制度实施以及宏观环境。个体特征类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男性成员占比、具有劳动能力人口占比、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得分、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占比等变量,均以家庭构成人员数量为分母。福利给付类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领取低保金的时长、累计享受专项救助的数量、是否享受过职业介绍以及是否享受过免费培训。制度实施类控制变量主要有受访者对问卷中“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不努力找工作”“很多该退的没退”“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问题的回答。前四个问题均采用李克特量表,问卷中1—5分别表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在数据处理中将其进行了反向编码,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越同意。最后一个问题在问卷中为三分类变量(1=公平,2=一般,3=不公平),在数据处理中同样对其进行了反向编码。在宏观环境的控制变量上,本研究参考安超(2021)的做法,设置了参保列队变量,分为2000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2001—2010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2011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三类。此外,地区变量也被作为宏观环境层面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表2展示了自变量、因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了参保队列、地区变量等个体特征变量之外,其他的变量均为时变变量。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保退出可能性	3744	.129	.336	0	1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3337	4.256	1.673	0	7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3744	.164	.370	0	1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3580	4.786	7.754	0	50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3744	.264	.441	0	1
家庭劳动收入(千元)	3744	6.968	13.671	0	156
家庭生活支出(千元)	3744	27.046	38.581	0	657.98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3744	.283	.307	0	1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3744	2.577	.891	1	5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3744	.093	.183	0	1

续表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成员占比	3744	.560	.261	0	1
领取低保金时长（月份）	3222	66.777	49.958	0	276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3744	.919	1.041	0	7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3694	2.392	1.223	1	5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不努力找工作	3679	2.127	1.111	1	5
很多该退的没退	3595	2.711	1.239	1	5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3691	2.807	1.295	1	5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3374	2.834	.475	1	3
职业介绍	数量	占比	免费培训	数量	占比
是	87	97.68%	是	157	4.19%
否	3657	2.32%	否	3587	95.81%
参保队列			地区		
2000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	128	3.95%	东部	1827	48.80%
2001—2010年综合发展阶段	1329	41.04%	中部	843	22.52%
2011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	1781	55.01%	西部	798	21.31%
			东北	276	7.37%

（三）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模型。在久期数据的分析中，事件史方法能够将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纳入模型，并很好地处理删截问题（陈强，2010）。在久期数据的事件史分析中，离散时间模型需要满意以下两个假设前提：事件是离散型的，表示为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二分变量；时间是离散型，风险率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是常量，或者虽然风险率随着时间变化，但是只在固定时点测度。由于本文的因变量的测度是二分变量（取值为0和1），且时间是离散型的，所以本文适合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模型。对此，本研究运用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方法构建logit回归模型来验证前文假设，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begin{aligned} \log[P_{it}/(1-P_{it})] = & \alpha_0 + \beta_1 Sc_p_I_{it} + \beta_2 Sc_p_II_{it} + \beta_3 Sc_h_I_{it} + \beta_4 Sc_h_II_{it} \\ & + \beta_5 Lab_{it} + \beta_6 Health_{it} + \beta_7 Edu_{it} + \beta_8 Male_{it} + \beta_9 Bon_time_{it} + \beta_{10} Aid_sum_{it} + \beta_{11} Privacy_{it} \\ & + \beta_{12} Dep_{it} + \beta_{13} Exit_{it} + \beta_{14} Check_{it} + \beta_{15} Fair_{it} + \beta_{16} Job_{it} + \beta_{17} Train_{it} + \beta_{18} Dl_i + \beta_{19} Aera_i \end{aligned}$$

公式中， P_{it} 表示个体退出低保的可能性， α_0 表示常数项， $Sc_p_I_{it}$ 和 $Sc_p_II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和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Sc_h_I_{it}$ 和 $Sc_h_II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和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Lab_{it}

和 $Health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家庭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和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Edu_{it} 和 $Male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和男性成员占比； Bon_time_{it} 和 Aid_sum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领取低保金时长（月份）和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Privacy_{it}$ 和 Dep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对“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和“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不努力找工作”的认同得分； $Exit_{it}$ 和 $Check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对“很多该退的没退”和“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的认同得分； $Fair_{it}$ 和 Job_{it} 以及 $Train_{it}$ 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的认同得分和是否接受职业介绍以及是否参与过免费培训； Dl_i 和 $Aera_i$ 表示个体 i 所处的参保队列和地区。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主模型分析结果

本研究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使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式考察关系网络对退保可能性的影响。表3为主模型统计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仅加入个体特征、福利给付、制度实施以及宏观环境四个方面的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垂直型关系网络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互惠型关系网络变量。可以看到，从模型1到模型3，拟合优度 Pseudo R^2 不断提升。

在模型2和模型3中，可以看到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强度与退保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更大规模和强度垂直型关系网络的低保家庭，退出低保的可能性更大。在模型3中，每增加1个单位的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低保家庭的退保概率将会随之提高14.2%；每增加1个单位的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低保家庭的退保概率将会随之提高59.5%。因此假设1成立。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尽管互惠型关系网络与退保可能性的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这种关系不具有显著性，因此假设2-2通过检验，假设2-1未能成立。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男性成员占比、领取低保金时长、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参保队列以及地区变量与退保可能性的关系。在模型3中，男性成员占比与退保可能性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即家庭男性成员占比越高，越不容易退保。这一发现与肖萌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保

持一致,表明在低保退出方面,并非是通常所理解的家庭中男性越多越能增加家庭收入进而退出低保。在领取低保金时长对低保退出可能性的影响方面,随着低保金领取时间的延长,退出低保的可能性会降低,这一发现也与前面所述的时间依赖、久期依赖等观点保持一致,低保的长期领取的确会产生依赖行为。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对低保退出具有负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福利叠加的确会降低低保退出的可能性。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在三个模型中均对低保退出可能性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低保对象越认为家庭收入核查繁琐,其退保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结果说明,收入核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福利依赖、应退未退现象。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对低保退出可能性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低保对象越认可评审过程的公平性,其退出低保的可能性越低,这一发现与常识有所出入。对此,本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对于已经受益的低保对象,尤其是那些长期依赖低保的对象而言,其低保资格的自我认同感较高而造成的。

在参保队列变量中,本研究仅发现相较于2000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2011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退保的可能性经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方向是负向的。这一研究发现在显著性和方向上均不同于肖萌等人(2019)和安超(2021)的研究。对此,本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两项研究采取的都是截面数据,而本文使用的则是久期跟踪数据。实际上,尽管在不同的参保队列中,2011年以后的制度环境更加健全,但是如果从低保领取时长来看,退保可能性的确是显著的负相关。在地区变量上,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低保对象退保的可能性均通过了显著的正向检验,即更容易退出低保。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无论是在低保金的标准上,还是在专项救助项目上,福利水平都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对退出低保存在一定限制。在就业支持方面,职业介绍和免费培训未能显著影响低保对象退保的可能性。这跟黄晨熹(2007),王燊成和刘宝臣(2018)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由于福利叠加和福利依赖效应的存在,职业介绍、免费培训等就业救助定位的双重偏差导致独立性缺失以及内容的粗放式设计造成供需瞄准不足等原因,现有的就业支持难以起到就业促进效果(王燊成,2023)。本研究并未发现福利污名效应的存在,问卷中“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不努力找工作”“很多该退的没退”等变量对退保可能性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基于赖志杰(2019)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家计调查被变通执行,导致我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未产生理论层面可能存在的“福利污名”。

表 3

主模型统计分析结果

	logit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143 ** (3.148)	.133 ** (2.835)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497 ** (2.666)	.467 * (2.437)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012 (1.574)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244 (1.471)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143 ** (3.148)	.133 ** (2.835)	.111 (.416)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497 ** (2.666)	.467 * (2.437)	.175 * (1.975)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012 (1.574)	.736 * (2.008)
男性成员占比		.244 (1.471)	-.973 ** (-3.103)
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011 *** (-3.485)	-.013 *** (-3.641)	-.014 *** (-4.006)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192 * (-2.309)	-.199 * (-2.271)	-.217 * (-2.430)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024 (.407)	-.009 (-.143)	.001 (.015)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053 (.812)	.057 (.809)	.036 (.511)
很多该退的没退	.084 (1.421)	.039 (.623)	.037 (.579)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164 ** (2.903)	.163 ** (2.676)	.162 ** (2.641)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646 *** (-5.754)	-.645 *** (-5.347)	-.624 *** (-4.983)
职业介绍	.413 (1.093)	.519 (1.365)	.584 (1.531)
免费培训	.117 (.349)	.191 (.562)	.180 (.529)
参保队列 (参照: 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1.155 ** (-2.582)	-1.511 ** (-3.202)	-1.689 *** (-3.545)

续表

	logit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1.413 ** (-2.667)	-1.760 ** (-3.137)	-1.988 *** (-3.520)
地区 (参照: 东部)			
中部	.549 ** (3.133)	.494 * (2.567)	.546 ** (2.776)
西部	.424 * (2.371)	.580 ** (3.109)	.614 ** (3.225)
东北	.130 (.431)	.244 (.802)	.300 (.977)
Constant	.346 (.454)	.201 (.236)	.355 (.411)
N	2770	2493	2406
Log likelihood	-747.778	-658.671	-637.755
Chi-Square	125.270	124.790	124.770
Pseudo R ²	.089	.101	.105

注: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二) 稳健性分析结果

考虑到主模型选取的是 logit 的离散时间模型, 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logit 模型 (稳健标准误)、probit 模型、cloglog (Complementary Log-Log) 模型以检验分析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 研究者通常假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符合某种分布, 因此选择不同的链接函数来对参数进行估计, 并比较它们的拟合效果, 从而达到稳健性检验。链接函数是用来将线性预测与事件发生概率 (或风险) 联系起来的函数, 常见的包括逻辑函数 (logistic function)、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probit)、累积对数风险函数 (cloglog) 等, 因此 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和 cloglog 模型能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基础上构成稳健性分析。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明显看出, 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cloglog 模型的回归分析与表 3 中的模型 3 的回归分析在结果上高度一致。垂直型关系网络无论规模还是强度均对低保退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表明垂直型关系网络对于低保退出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不过,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对于退保可能

性的影响依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检验说明，之前的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分析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cloglog 模型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133 ** (.005)	.073 ** (.002)	.119 ** (.007)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467 ** (.015)	.245 ** (.013)	.422 ** (.018)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012 (.116)	.006 (.134)	.011 * (.096)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244 (.141)	.133 (.118)	.226 (.145)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111 (.677)	.037 (.785)	.106 (.671)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175 ** (.048)	.010 ** (.026)	.150 * (.071)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736 ** (.045)	.375 * (.058)	.662 * (.052)
男性成员占比	-.973 ** (.002)	-.437 ** (.005)	-.949 ** (.001)
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014 *** (.000)	-.006 *** (.001)	-.013 *** (.000)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217 ** (.015)	-.109 ** (.013)	-.198 ** (.017)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001 (.988)	.000 (.994)	.004 (.947)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036 (.609)	.019 (.594)	.035 (.598)
很多该退的没退	.037 (.563)	.014 (.667)	.036 (.548)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162 ** (.008)	.084 ** (.007)	.149 ** (.010)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624 *** (.000)	-.340 *** (.000)	-.541 *** (.000)
职业介绍	.584 (.126)	.289 (.166)	.558 (.103)
免费培训	.180 (.597)	.097 (.591)	.174 (.576)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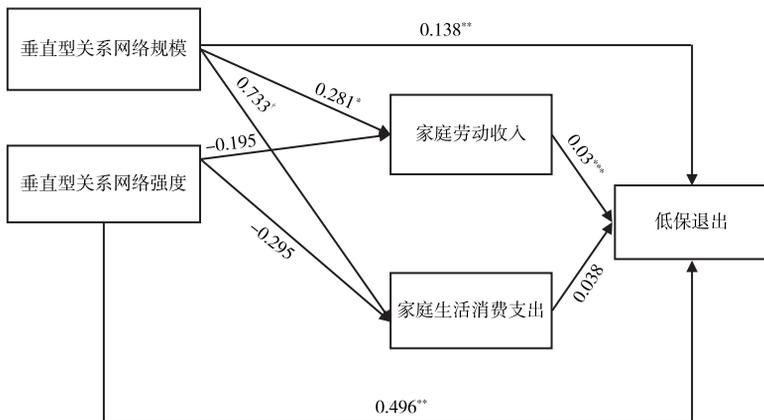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cloglog 模型
参保队列（参照：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1.689*** (.000)	-.835** (.001)	-1.533*** (.000)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1.988*** (.000)	-.945** (.003)	-1.815*** (.000)
地区（参照：东部）			
中部	.546** (.006)	.272** (.006)	.497** (.007)
西部	.614** (.001)	.317*** (.001)	.560** (.002)
东北	.300 (.329)	.159 (.292)	.262 (.365)
Constant	.355 (.681)	-.074 (.872)	.042 (.957)
N	2406	2406	2406
Log likelihood	-637.755	-639.785	-637.586
Chi-Square	124.770	121.200	145.040
Pseudo R ²	.105	.102	—

注：（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logit 模型一列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robit 模型与 cloglog 模型一列中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中介机制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中介机制，本文进一步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GSEM）的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来检验家庭劳动收入与家庭生活消费的中介效应，该模型被视为生存分析中检验中介机制的最佳方法（Beydoun et al., 2022；Dil & Karasoy, 2020）。由于因变量的二元性质，本研究在 Stata17 中使用带有最大似然 Logit 估计的 GSEM 模型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如图 2 所示）。结果如下：

第一，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中介机制对低保退出起到正面促进作用，而家庭劳动收入的中介机制在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中不成立。这表明，相比于强度，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对于推动低保户家庭退出低保而言更加重要，也说明在农村地区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背后所表征的“弱关系”对于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积极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本身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村民大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2 家庭劳动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中介机制分析图

多从事灵活或者零散的劳动，如小时工、日结工等（孙婧芳，2021）。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则意味着村民更有可能从垂直型关系网络中获得稀缺的就业机会或者信息等资源，进而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机制，提升低保户退出低保的可能性。

第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中介机制不成立。垂直型关系网络无法通过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对低保退出产生影响。既有文献表明，低保户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在获得低保补贴后，贫困家庭整体消费支出则会增加（陈典等，2022）。因此，对于消费需求处于紧缺且未得到完全满足的低保户家庭而言，关系网络所发挥的福利替代作用难以通过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方式而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2015—2017年的三年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退出的影响。

研究发现，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对象退出低保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关系网络都能够发挥作用。一方面，垂直型关系网络是低保户家庭

退保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在基层治理中，基于乡村干部建立的垂直型关系网络的确起到了资源输入的渠道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可通过提高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互惠型网络关系并不能显著提高低保户退保的可能性，这说明基于邻里互惠模式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减贫过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的有限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优化低保相关治理，实现救助对象的动态进出，实现科学管理。第一，要积极发挥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在引导其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使其发挥好资源整合与支持的作用。第二，要关注福利依赖和福利叠加效应对于低保退出的抑制作用，建议未来可以对低保金领取时间进行一定限制，要进一步取消专项救助与低保捆绑的做法，优化各项救助项目的评定细则。第三，要优化低保制度的基层实施，除了发挥好基层干部的作用以外，还应该推动低保评审过程的实质性公平，优化健全家庭收入核查机制以实现常态化的追踪式监管评估。第四，要关心贫困家庭的就业问题，注重发挥关系网络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积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福利观，帮助其提高就业能力，尤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可以积极探索提高土地要素产出、优化资本帮扶形式、夯实知识产出基础等路径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王道勇，2023）。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潜在贡献：一方面，本研究在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同时还构建了为数不多的低保户跟踪调查数据，这既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和捕捉低保户进入低保后再退出低保的过程，也避免了既有研究忽视中间退出低保再重新进入低保所造成的过程非连贯性。另一方面，本研究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对社会资本与减贫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一定回应。

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未来今后继续讨论。比如，尽管本研究使用了三年的面板数据，但实际上对于低保对象而言，以三年为周期的低保进入与退出行为相对较为短暂，因此数据本身未能以长时段的方式捕捉到低保对象进入与退出的动态变化过程。又比如，受数据库本身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稍微陈旧，但是本研究认为基于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结论仍然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借鉴意义。未来可以从进一步构建长时段且更新的追踪数据库方面入手，推进现有关于低保退出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 艾广青、刘晓梅、孙健, 2009,《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核算探析》,《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
- 安超, 2021,《退出低保: 基于社会救助功能变迁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 边燕杰、李煜, 2001,《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
- 卜长莉, 2019,《城市低保群体的生存困境及发展型社会救助的选择——以C市低保户集聚区为例》,《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
- 陈典、郑晓冬、方向明, 2022,《农村低保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陈锋、朱梦圆, 2019,《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陈强, 2010,《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崔宝琛, 2019,《低保目标瞄准偏差的乡土逻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方菲, 2012,《社会排斥视野下农村低保对象的生活图景探究——基于湖北省X村和T村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高灵芝, 2009,《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视野中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问题研究》,《东岳论丛》第2期。
- 高瑞琴、叶敬忠, 2017,《生命价值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人口研究》第2期。
- 关信平, 2019,《新时代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化路径: 提升标准与精准识别》,《社会保障评论》第1期。
- 郭忠华、夏巾帼, 2022,《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 ——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韩华为, 2019,《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人口学刊》第6期。
- 韩华为、徐月宾, 201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果研究——来自河南、陕西省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韩克庆, 2015,《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教学与研究》第2期。
- 韩克庆、郭瑜, 2012,《“福利依赖”是否存在?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胡琳玉、万成龙, 2023,《村干部落实低保政策的权变行为研究——基于浙江省丽水市S县H村的田野调查》,《领导科学论坛》第7期。
- 黄爱宝, 2013,《生态行政约谈制度: 创新价值与完善方向》,《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 黄晨熹, 2007,《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以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黄薇、曹杨, 2022,《常态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 反福利依赖的视角》,《经济研究》第4期。
- 金光照、陶涛, 2022,《老为何所困, 老因何而贫: 新时代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8年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2期。

- 赖志杰, 2019, 《“福利污名”在农村低保中真实存在吗? ——兼析农村低保家计调查目标定位方法的变通执行》, 《河南社会科学》第11期。
- 乐章、程中培, 2017, 《收入是低保制度的唯一认定标准吗? ——基于政策文本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学习与实践》第7期。
- 李琴、岳经纶, 2021,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 ——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第3期。
- 李迎生、李泉然、袁小平, 2017, 《福利治理、政策执行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基于N村低保的考察》,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正东, 2018, 《结构性困境与关系性约束: 城市低保家庭的社会处境及其脱贫行动选择》, 《人文杂志》第10期。
- 梁晓敏、汪三贵, 2015, 《农村低保对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第11期。
- 刘峰, 2012,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困境与突围》, 《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
- 刘凤芹、徐月宾, 2016, 《谁在享有公共救助资源? ——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效果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刘璐婵、林闽钢, 2015, 《“养懒汉”是否存在? ——城市低保制度中“福利依赖”问题研究》, 《东岳论丛》第10期。
- 刘万里、吴要武, 2016, 《精准识别: 用技术完善城市低保的退出机制——以上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为例》, 《经济学报》第4期。
- 刘艳霞、张诗怡, 2023, 《从脱贫到振兴: 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空间提升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第3期。
- 刘央央、钟仁耀, 2019, 《城乡低保对象认定标准中增加支出标准的合理性分析——基于悬崖效应的视角》, 《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 吕德文, 2019, 《扫黑除恶与基层治理生态完善》, 《人民论坛》第28期。
- 乔世东, 2009, 《城市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东岳论丛》第10期。
- 仇叶、贺雪峰, 2017, 《泛福利化: 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偏移及其解释》, 《政治学研究》第3期。
- 孙婧芳, 2021, 《城镇低保中错保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3期。
- 汪三贵、A. Park, 2010,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估计与瞄准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第2期。
- 王春超、周先波, 2013,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管理世界》第9期。
- 王道勇, 2023, 《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主要约束与对策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王燊成, 2023, 《何以授人以渔? ——就业救助制度的演变发展、短板不足及其路径优化》, 《东岳论丛》第5期。
- 王燊成、刘宝臣, 2018, 《就业促进政策能提高城镇困难家庭的就业参与吗?》, 《学习与实践》第12期。
- 魏程琳, 2014, 《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农村低保》, 《青年研究》第3期。

- 吴忠民, 2023,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陷阱”的成功规避》,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
- 肖萌、陈虹霖、李飞跃, 2019,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难? 动态分析策略下的退保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 《社会》第4期。
- 肖萌、李飞跃, 2017, 《工作还是依赖? ——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学刊》第1期。
- 徐月宾、张秀兰, 2009, 《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东岳论丛》第2期。
- 闫春华, 2019, 《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实践及内在机理——以辽宁省Z县A村养殖业为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均华、刘璨, 2019,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决定因素与反贫困策略》,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叶静怡、周晔馨, 2010,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 《管理世界》第10期。
- 尹志超、张栋浩, 2020, 《金融普惠、家庭贫困及脆弱性》, 《经济学(季刊)》第5期。
- 岳经纶、胡项连, 2018, 《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 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 《中国行政管理》第8期。
- 张国磊、张新文, 2017, 《制度嵌入、精英下沉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的个案考察》, 《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 周玉龙、孙久文, 2017, 《社会资本与农户脱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研究》, 《经济动态》第4期。
- Bane, M. J. & D. T. Ellwood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 (1).
- Banerjee, A. V. 2012,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Beydoun, M. A., H. A. Beydoun, S. Banerjee, J. Weiss, M. K. Evans & A. B. Zonderman 2022, “Pathways Explaining Racial/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Incident All-Cause Dementia among Older US Adults across Income Groups.”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12 (1).
- Bian, Y. J.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
- Burt, R. S. 2004,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 (2).
- Buunk, B. P. & W. B. Schaufeli 1999, “Reciprocity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Its Importanc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1).
- Cleaver, F. 2005,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3 (6).
- Contini, D. & M. G. Richiardi 2012,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Welfare Stigma on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4 (1).
- Dil, E. & D. Karasoy 2020, “Gsem: A Stata Command for Parametric Joint Modelling of Longitudinal and Accelerated

- Failure Time Models.”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196.
- Falco, S. D. & E. Bulte 2011, “A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Kinship,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 (8).
- Foa, E. B. & U. G. Foa 2012, “Resourc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In K. T?rnblom & A. Kazemi (eds.), *Handbook of Social Resource Theory: Theoretical Extensions, Empirical Insights, and Soci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 Hohmeyer, K. & T. Lietzmann 2020, “Persistence of Welfare Receipt and Unemployment in Germany: Determinants and Duration Dependenc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9 (2).
- Katz, L. & J. H. Powell 1955, “Measurement of the Tendency Toward Reciprocation of Choice.” *Sociometry* 18 (4).
- Li, S. & T. Sicular 2014,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 Liu, L. & Y. Wang 2023, “The Multilevel Politics of Government-Business Collaboration in 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
- Molm, L. D. 2010, “The Structure of Reciproc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3 (2).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Putnam, R. D. 2001,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 (Spring).
- Rook, K. S. 1987, “Social Support versus Companionship: Effects on Life Stress, Loneliness, and Evaluations by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6).
- Tilburg, T. V., E. V. Sonderen & J. Ormel 1991, “The Measurement of Reciprocity in Ego-Centered Network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 Comparison of Various Indic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4 (1).
- Walker, M. E., S. Wasserman & B. Wellman 1993, “Statistical Models fo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2 (1).
- Wellschmied, F. 2021, “The Welfare Effects of Asset Mean-Testing Income Support.” *Quantitative Economics* 12 (1).
- 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2).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王燊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良伟）

责任编辑：郭云蔚